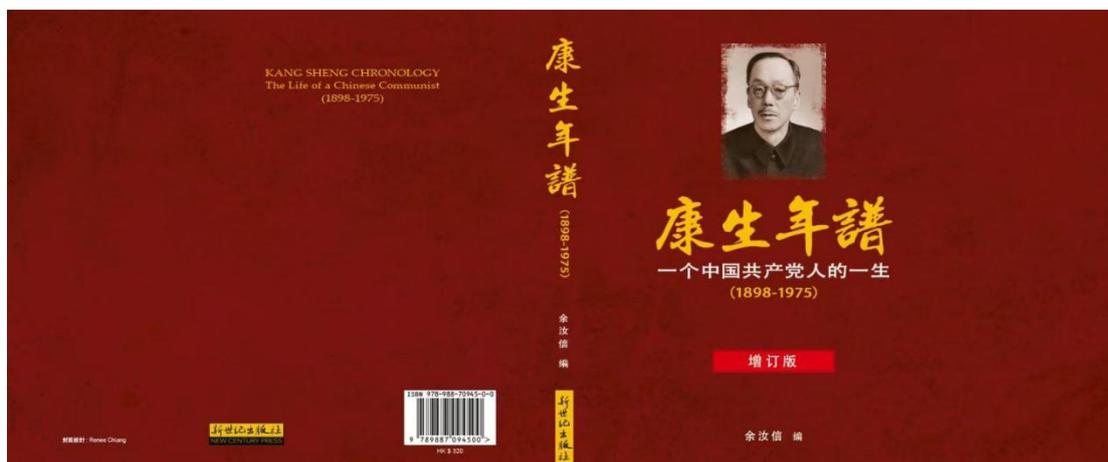


《康生年谱》（增订版）

《康生年谱》（增订版）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在香港出版。



ISBN:978-988-70945-0-0

增订版后记

《康生年谱》于2023年4月初版后，至2024年10月已告售罄，此后仍有不少读者询问，甚至不惜高价以求。今与出版社商量，与其将初版原样重印，不如将初版编纂时未见的康生生平资料增补录入，作为增订版出版，售价不变，以飨读者。

本次增补录入共计26个条目，一万一千字。分别为：

- 1960年代马南邨（邓拓）有关评介鲁赤水（康生笔名）绘画的文章两篇；
- 中华书局涉及康生之指示及送书规定两条；
- 康生有关《聊斋志异》版本问题致金灿然等信函两条；
- 康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交往活动十二条；
- 文革期间康生对中共中央调查部讲话、指示八条；
- 删去1967年一则出处未详的讲话。

挚友赵望今先生为本次增补工作提供了多条珍贵史料，特表深切谢意！

余汝信

2025年6月于香港

《康生年谱》（增订版）增补内容

1961年

12月14日 《北京晚报》马南邨（邓拓）专栏“燕山夜话”刊载《从鲁赤水¹的墨菊说起》一文称：

最近新到北京有一批木版水印的中国画，由上海“朵云轩”出版，其中有鲁赤水同志画的墨菊条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在这幅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枝傲霜挺秀的菊花，高洁拔俗，独立不倚。作者用篆书题了“晚节华香”四字，另一行草书为“国庆十周年”。这就明白地显示了作者画这幅画的用意所在。的确，以菊花的高尚性格，来象征我们人民的国家，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在我国古代的诗学和艺术作品中，菊花成为最普遍的题材，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陶渊明爱菊的故事和赏菊的作品，人所共知，用不着说了。但是，我却不喜欢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精神状态，而比较喜欢陆放翁的“荚荚篱下菊，秀色独满枝”的高昂气概。可见同是菊花，由于人们的处境不同，对它的认识也就不同。然而，菊花本身毕竟有它的独特性格，这是客观的存在，并不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同而有所改变。在这一点上，鲁赤水同志的墨菊，似乎颇足以表现菊花的固有性格。

……

现在的画家们往往注重于大作品，这当然是要紧的：可是，对于一些小品似乎又有所忽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点。今天从鲁赤水同志的墨菊看到一种新的端倪和新的趋向，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了这许多话。²

1962年

7月29日 《北京晚报》马南邨（邓拓）专栏“燕山夜话”刊载《一幅墨荷》一文，同版配有署名鲁赤水的国画《荷花》的图片。马南邨的文章称：

“少习丹青艺未通，弃家搁笔醉东风。

淤泥不染人间换，戏把苍毫学画工。”

这是鲁赤水同志为他自己画的一幅墨荷所题的绝句。我记得曾经向大家介绍过鲁赤水同志画的墨菊。但是，我们读到作者自己的题诗，这却是第一次。而这一首诗等于是作者对他自己创作的所有画幅的总题。

¹ 鲁赤水为康生笔名。

² 《北京晚报》，1961年12月14日。

显然，作者早年就已经掌握了中国画的技巧，后来因为长期参加革命斗争而弃家搁笔。在中国革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之后，作者自己和可爱的祖国，正如荷花一样，从混浊黑暗的淤泥中，站了起来，战胜了和摆脱了黑暗势力的侵染和束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候，作者为了歌颂我国革命的胜利，歌颂劳动人民的翻身，情不自禁地要利用业余的有限时间，重新拿起画笔，描写广大群众最熟悉的，同时又是作者认为最足以表达自己内心感情的事物。³

1963年

5月12日 在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工作会议的刘澜涛⁴，到杭州康生住处看望。刘与康谈到毛泽东指示精神可以概括为：决心要大，要稳，要长，要分地，分期，分批，要有强的领导。⁵

7月1日 就有关《聊斋志异》版本问题致函金灿然⁶、陈乃乾⁷称：

金灿然同志

陈乃乾先生：

六月十四日来函，早已收到。因离京外出，未能即复，歉甚。

山东送来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齐燕铭同志已交我，翻了一下，觉到此本与铸雪斋本差不多，如果要印铸本，此本即不必再印。

来函对张希杰、董元度作了一些考证，很有参考价值。我对张希杰是一无所知。至于董元度，我还可补充些材料。董为山东有名诗人，他是董讷的孙子，乾隆壬申进士，曾官安远知县，后为东昌府教授，著有《旧雨草堂集》。前人评其诗曰：激昂而不怒，跌宕而不淫。戏而不虐，正而不迂。远有会，近有喻，嗣响文简不虚云。（董讷，康熙丁未探花，历官江南总督、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著有《柳村诗集》。讷子董思凝，康熙戊辰进士，著有《海棠巢小草》《淮行草》等诗集。其子即董元度。）

铸本已校完，可喜。完成这一繁重工作，颇不容易。近在旅途中偶翻三会本《志异》，该校者根据铸本将王渔洋诗末句的“诗”字，校作“时”字，并根据遗稿本加以解释。我觉得以“诗”作“时”，值得考虑。这样一改，据说是合乎蒲氏和诗末韵，但使王诗末句却成了不通的文字。“时”不能“听”，韵文诗歌亦不能有此混乱不通的语法。遗稿本云“作诗字则味短而句死”，殊不知王渔洋此处恰恰是套用的李长吉“秋坟鬼唱鲍家诗”

³ 《北京晚报》，1962年7月29日。

⁴ 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⁵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页138。

⁶ 金灿然，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⁷ 陈乃乾，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时任中华书局编辑。

的句子，遗稿本所解，只是强词欺人而已。我以为铸本作“时”是误写，应校正。异史本、山东送来的二十四卷本皆作“诗”字。

铸本错字脱句处不少，《三朝元老》篇后，无洪承畴事，似应补入。全部校文我未看，因翻《促织》评语时，偶见将“土于盆而养之”的“土”字，校作“上”字，其实铸本原文未错，手稿本也还是“土”字。

异史本我未细阅，此本最大的特点，是名曰“异史”。不仅全书的目次、卷次、“题后”皆标“异史”，而高珩的序言首句亦曰“史而曰异”，这与各本皆作“志而曰异”是不同的。

异史本的发现，对研究《聊斋志异》者，确有参考价值。例如：

一、可使人了解作者自称“异史氏”的来源。

二、可有根据的推断康熙十八年作者确已编成一书，初名“异史”。此书载有康熙己未高珩的序言和作者的自叙。但当时书内故事较现在为少。以后作者继续写作，编入原书，增大篇幅，又改名为《聊斋志异》。改名之说，赵荷村昔已言之，但初名《鬼狐传》之说，似无确证，晚清京都三多斋本标名《鬼狐传》，这显然是根据赵说而来的，不足为据。

三、个别地方，反清词句较铸本为全，如“汉人作满洲调”。

四、根据此本，可以解释高序和自叙的年代（康熙十八年）与文内某些故事的年代（其中有康熙二十及三十几年的事）的不符原因。

书中还有其他可供研究之处，不一一例举。

至于是否不印铸本，改印异史，我以为既然铸本已完成制版和校勘工作，似无改印的必要。其与异史本不同之处，校勘时加以注明或用校后记加以说明即可解决，因两个本子的重大差异之处并不多的。当然，既然影印，又不印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可能读者有意见。此事还请你们与燕铭同志商定。

现在《聊斋志异》的本子并不少，所缺少的是新评精选本。《聊斋志异》是一部好书，但其内容是精华糟粕混杂，其中无聊的、恐怖的、迷信的、封建反动的篇章也实在不少。我没有作过精确的审查和分析，约略估计，大概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可以删去。过去批评《聊斋志异》的人也不少，但除作者自评外，很少好的，不是腐气薰人的八股腔，就是封建道德的说教。三会本把一些乱七八糟毫无参考价值的评语搜罗在一起，实在令人望之生厌。现在需要一种新选新评的本子。所谓新选，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谓新评，就是以历史主义的观点，不是以虚无主义的观点，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不是以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逐篇加以评注，这种评语不要长篇大论，只要用简要的语言将作者通过寓言和鬼狐故事表达他反民族压迫、反封建礼教、反科举制度等等进步的思想概括的指出就可以。这种新的评选工作，对于现在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很有必要。不知中华书局能否进行这一工作？

顺笔写来，扯得很长。所说各点，可能不对或不全对，只是供各位同志参考。

铸雪斋毛印本阅完即退回，不过最近尚无工夫看，如急用，可来取。

最近在成都看过四川大学所藏的黄炎熙选抄本《聊斋志异》，这本子亦还是有一些用处，但也无甚特异之处。

敬礼！

康生

1963年7月1日⁸

9月24日 就有关《聊斋志异》版本问题再次致函金灿然等称：

金灿然同志转山东人民出版社：

谢谢你们将廿四卷本《聊斋志异》送给我看。现将全书送还，请查收。

因工作忙，对此本没有细看，更没有与它本校对。最近你们来信问我，只得略翻书中某些要点，将几点不成熟意见提供参考。

一、从异史本发现，推知《聊斋志异》初名“异史”，后改“志异”。从廿四卷本发现，更知除手稿本外，还有六卷、十二卷、廿四卷各本。至于青柯亭十六卷删改本，黄炎熙十几卷选尤本，王金范十八卷删定本，文宝堂刊八卷摘抄本，蔡君鹤四卷删评本，尚不在内。川大所存之黄炎熙选订本，仅存至十一卷。有人定此选本为十二卷，系根据川大图书馆之推断。

二、廿四卷本的发现，增加了《志异》版本资料，颇有价值。铸雪斋本缺页失篇，有目无文者不少，此本比较完全，但也有缺陷。两本各有短长，可相互参考。据我看此本与铸本源出一系，两本在自序中俱将“干宝”误作“于宝”，将“抱树”误作“把树”等等，似非偶然。（两本在张笃庆题词诗中之“干宝”，也都误作“于宝”，错得可笑。）两书称淄川皆作般阳，它本未见。查淄川汉晋时称般阳，古名也。

三、两本关于反满故事反满词句，基本保留，所异亦不甚大。但沂水秀才附志中之“汉人作满洲调”一语，两书皆将“汉人”二字删去。顺便提一下，《文史哲》所载之“校后记”，以“歪科甲谈时文”为是，诗文应作时文，似不妥当。

四、以前我常想，手稿本下部，也许尚在人间，发现的可能，还未完全消失。近来异史本及廿四卷本的出现，使我觉得这种可能更大了一些。我很希望山东同志继续努力搜寻《志异》版本和蒲氏其它著作。

敬礼！

⁸《康生同志有关〈聊斋志异〉版本问题的两次来信》（一），载《业务情况》，中华书局总编辑室编印，1963年10月25日。

1963年9月24日⁹

9月26日 与刘澜涛通话，指出电影《红河激浪》值得研究，是否同西北党史的不正确反映有关。¹⁰

9月28日 傍晚，刘澜涛到钓鱼台八号楼康生处谈话至晚9时。¹¹

1964年

4月15日晚上，与邓小平、彭真在刘澜涛陪同下观看秦腔剧《镇台念书》、《一文钱》等。11时20分至次日凌晨2时20分，与刘澜涛长谈。主要谈75人委员会问题及学习理论工作问题。¹²

6月4日 中午，刘澜涛将成立西安历史学会问题和同西北局党校负责同志谈话批送康生参阅。信中写到，刚才在会场交你便条说到西北局党校讲授党史问题。现在将我同党校负责人有关这一问题的谈话和成立西安历史学会的意见送你参考。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些想法，以便最近同你面谈时得到具体指示。晚上，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看戏时对刘澜涛说：历史学会信写得很好，详面谈。¹³

6月16日 上午，刘澜涛到家中看望曹轶欧并畅谈书画。曹送刘澜涛夫人刘素菲“花镜”和“群芳谱”各一套。¹⁴

9月1日 晚上，刘澜涛到家中长谈（晚8时半至次日凌晨4时半，共约8个小时），与刘主要谈党内情况、两条路线斗争情况和对王从吾的批评。¹⁵

12月23日 晚上，电话通知在京参加会议的刘澜涛：24日上午召开杨献珍座谈会，西北有关同志参加。¹⁶

1965年

3月12日 致电刘澜涛：彭、习专案委员会将派9人到西安调查。13日，杨以希（中

⁹ 《康生同志有关〈聊斋志异〉版本问题的两次来信》（二）。

¹⁰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147。时反映1930年代陕北高原革命斗争的电影《红河激浪》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文革期间，该片定性为“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

¹¹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148。

¹²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167。75人委员会，指1962年9月成立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

¹³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176。

¹⁴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178。

¹⁵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189。

¹⁶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198。

组部副部长)、史进前(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华楠(《解放军报》总编辑)等抵达西安,与刘澜涛等谈工作安排。¹⁷

10月1日

下午,刘澜涛到家中看书画。给谭启龙、张超、谷牧等人作画。为刘素菲画一幅兰花,用鲁赤水笔名。¹⁸

10月19日 刘澜涛中午在北京给康生写信,反映与会同志要求早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大家一致建议中央早日出版毛选五卷,如暂时不公开出版,我们至盼先在内部一定范围发行。¹⁹

12月11日 在上海期间,下午5时至7时40分,陈毅、刘澜涛,张爱萍、吴冷西等先后去康生处,大家一起漫谈。将秦砖砚拓片交刘澜涛转刘素菲,并谈到最近咸阳西汉古墓兵马俑壮观。毛泽东亲自指导对七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言和注释。²⁰

1967年

1月1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共中央调查部“联络站”和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共一百五十名代表。就调查部问题讲话称:

“请坐请坐,看到青年同志啊,真是羡慕得很啊!什么时候我像你们的年龄就好了,现在年青同志,真是敢叫日月换青天,和二十年前不同了,又是造反派,大有希望。”

“九点钟还有个会,接见上海的代表,我意见你们调查部三个代表,国际关系学院三个代表去参加他们的会。”“陶铸的问题和李富春、陈毅、……问题性质不同……李富春病了。我是赞成你们这种革命造反精神的,赞成和支持你们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反对调查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精神,我完全赞成!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问同志们身体好。”

“昨天你们看到了人民日报一篇《告上海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报上还有按语,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这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新的阶段。”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洪流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节节败退,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已经或正在被揭穿……开始全线崩溃。你们机关运动是在全国形势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¹⁷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203。时彭德怀、习仲勋两专案委员会合并,同时成立西北调查组,设在西北局机关。

¹⁸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213。

¹⁹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217。

²⁰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页222。

“整个形势是这么一种形势，我为什么见了同志们的面先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调查部长期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是个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不把你们部变成毛泽东思想调查部不行，所以我同同志们见面时，首先要把毛泽东思想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说是限制你们革命，没有这回事，相反，是想使你们掌握毛泽东思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总想同志们在革命时掌握这东西，这是最基本观点。调查部二十几年来就是这么个问题，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你们一面要破，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要立，立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调查部是同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机关，如果不掌握毛泽东思想红旗，不能掌握这业务，或者会变成资产阶级的情报机关。同志们要念：不忘阶级斗争，念：不忘毛泽东思想。这个大方向要掌握，不至于走岔路。……你们讲调查部的业务谁管？你们管！你们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挺起腰杆，不要怕框框、教条、神秘的东西，相信自己，我们要相信你们，你们也要相信你们，依靠你们。”

“我来时，周总理交给我一个重要的对调查部文化革命的三点意见。”“根据你们的要求，中央讨论决定三条，中央决定：

(一)孔原停职反省，并成立专案小组审查。专案小组由解放军新出的干部一名，调查部革命干部和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若干名，共同组成。

(二)调查部和学院经过文化大革命实现革命化，中央再考虑把调查部和国际关系学院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这一点我不懂，原来，解放初期，调查部同解放军是统一的，不晓得为什么忽然把它分出来，我看是个错误……中央决定我赞成。我长期不了解为什么同军事机关分割开来，当前为了加强调查部领导，中央决定由解放军调两名干部去工作，和邹大鹏²¹同志一起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原来决定的两个人叫贺瑞林、焦志军，为了更加强业务工作领导，改调席一、黄政基同志去。席一是我(原)驻东德武官，黄政基是驻古巴武官。

(三)调查部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定时期，应考虑从调查部青年干部中选拔一批青年同志到各级适当岗位，同时从国际关系学院学生中选二、三十名到调查部各局工作。”

“三条是主席批准的。”

“同志们说调查部工作是我管，这是个造谣。原来是邓小平管，邓小平出了问题推给陶铸，陶铸出了问题推给我。我说我现在不能管，文化大革命是李富春，业务没有定，我管不了业务，你们管，上面有总理，解放军两同志就要来了，我去联系一下，”

“我明天把那两个同志找来，你们选择可靠同志同解放军同志和邹大鹏同志一起批，你们应该挺起腰板来，应该当主人，你们自信心还不那么够，刚刚解放出来。”²²

2月1日 就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砸掉朝方在北京、广州情报站的“革命行动”电话指示

²¹ 邹大鹏，原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

²² 郝汀、章钟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自印本，2013年，页57-61。

称：

你们革命造反联络站今天有个报告，讲到朝鲜情报站问题，我同总理看到了，总理、富春和我看到了。

我们有几点意见告诉你们：

1.我们支持你们这种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好的，我支持，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2.但是明天2号你们去直接交涉，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两国关系、两国协议，必须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你们的革命精神要与外交途径结合起来。

3.这件事，过去两国均有协议，现在他们破坏了协议，我们有种种理由令其撤退，但是必须区别对待。研究对策后再由外交系统分别解决，同为涉及北京、广东、山东、香港的问题。

4.总理答应同我一起在一、二天之内接见你们的代表，同你们谈谈这件事情的对策，以便使这个问题更有效更顺利地解决，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同你们共同商量共同解决。²³

3月2日 对中央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和“联络站”报送的关于调查部地方部两派争夺档案问题的报告批示称：“上海、广州、天津及各地之档案如何处理，其权属于中央和中央调查部，各地调查部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无权接管，不能夺权，任何人未经上级批准和任命，不得阅看档案材料，各地调查部的工作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确保党和国家秘密。”²⁴

4月28日周恩来、李富春接见邹大鹏²⁵和中央调查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国际关系学院50余人约四小时。在接见时讲话称：

△康老：主席说，要历史地看干部，对干部要上上下下结合。××部要会调查，我看你们调查工作做得不够。孔原有没有人去调查过？你们有好多专案，可以到各地去调查调查嘛。南开的“八一八”、北航，认真调查研究，比××部做得好。（许金生提到谢富治同志不同意等）你们都那么听话？不见得。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来就要分析，材料[有]真有假，半真半假，要学会分析，有的敌人故意给我们假情报，迷惑我们，干部的材料也是这样，要调查，要加以分析，加以核实，有些问题，可以存疑。文化革命中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一个东西就相信了。有的看来好象没有问题，但一调查就有问题。

△康老：说到二月兵变，我顺便插一下。说二月兵变，有些我不晓得，开始我有些晓得，现在传到全国，外国记者传遍全世界，这件事你们××部要分析一下，到底什么事……。

彭、罗、陆、杨要篡党、篡政、篡军，时机成熟了，他们要夺取政权，这是确实的。他

²³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页 69-70。

²⁴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页 66。

²⁵ 邹大鹏，原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1966年12月19日李富春曾指示中调部的业务仍由邹大鹏、冯铨、罗青长三位副部长抓起来，邹有病，冯、罗可多抓些。惟此次接见后第二天4月29日半夜，邹大鹏夫妇自杀身亡。

们是赫鲁晓夫，我们还把他作接班人。五月十六日“通知”上写到，一旦时机成熟，就要篡……。这是毛主席写的。当时，我们对那一段了解不够，没有发觉是谁，现在想想很清楚了。当时写的，就是刘、邓，这一段很重要。实际上，完全证明了主席、中央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时机成熟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资产阶级专政，要篡党、篡军、篡政，这是一件事。至于二月兵变具体这件事怎么来的？为什么在二月？说法很多。二月事情很多，彭真的“二月提纲”也在二月；彭真曾下命令在北大驻一个团，在人大驻一个团，这件事军委晓得，解放军确实到北大、人大去看过房子。以后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去驻。（总理：军委考虑不大合适。）以后搞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件事实在六月一日聂元梓大字报出来后，北大同学怀疑这件事，怀疑彭真，想到彭真是否有阴谋。华北局也传出这事，说彭真要做华北军区政委。政委是李雪峰。北大师生对这件事有怀疑，是否彭真有阴谋，这件事传到师大去了，井冈山谭厚兰一派，当时很小，十多个人，把北大大字报搞到师大去了，也怀疑彭真要在学校驻军，为什么？师大工作组孙友渔[余]利用这件事情，镇压革命左派，说谭厚兰一派有意造谣，挑拨人民同解放军的关系，打击左派，一挑动就挑动起来了，当时把谭厚兰打得很厉害，好象还出了一个简报，第八期简报，我后来到师大去反对孙友渔[余]，讲起这件事，我讲话了，这不是谭厚兰造谣，确实有这件事，确实有解放军去北大看房子，为什么师生怀疑一下彭真不行呢？他们完全不是造谣嘛！而且北大有人看到了解放军了，可以证明嘛！我就在这会上讲了这话，意思是揭露孙友渔[余]镇压革命群众。讲完后，师大又贴了一张大字报：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这件事传人大去了，当晚就把郭影秋揪回人大，问郭有没有这回事？郭说到有。后来又问他什么目的？为什么彭真要搞政变？这样北大、师大、人大极注意这件事，这时正是邓、陶到人大去，那时邓、陶的问题还没有揭开，他们说，哪有政变？没有这件事。他们是保郭景秋。其实那时北大、师大也没有说一定有政变，是怀疑这件事。邓小平一保，这事当时过去了。邓、陶问题揭开了，革命师生一想，咳！这一定是个大阴谋，这件事一定有了。真要篡……是一回事，不能从这件事，是说二月政变。是不是在二月搞，不一定。后来事情又发生了，后来陆平又到南口去搞民兵，吹牛说他在那里打过游击。65年罗瑞卿到云南；66年初，邓小平到三线去，彭真到三线去，也联系起来。有人在大会上问彭真，彭真冷笑。打得不准，你追问他这件事他很高兴，助长了敌人的威风。

周总理：康老的意思是要你们××部了解一下。听了之后，我也一笑，没有这件事，不要去贴这种大字报，正在满街都是。（康老：革命群众怀疑是许可的。）革命群众怀疑是许可的。五月十六日通知是对的，但不一定就是二月要兵变。

△康老：（学院同学谈及熊友臻²⁶问题后），我希望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相信我的话，应

²⁶ 熊友臻，熊向晖的姐姐，申健的夫人，时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当说，××部从三七年成立已三十年了，三十年中，一件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就是胡宗南的工作。解放战争中，申健²⁷、陈忠经²⁸、熊向晖²⁹、熊友臻，也包括罗青长，这五个人对我们是有很大功绩，不管他们现在有什么错误，这件事他们是有很大功绩的。胡宗南的作战计划能够立刻搞到，这个××工作搞到家了。(总理：熊作胡宗南的秘书，有资产阶级作风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问题复杂，胡宗南才把熊向晖当秘书，申健、罗青长、陈忠经上胡宗南三青团的负责人，包括胡宗南的电台，统统我们掌握了。熊向晖的姐姐，那时不是党员，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是比较落后一些，她不是这样的人，怎么接近胡宗南？！没有熊友臻与胡宗南关系，他们几个到不了胡宗南那儿工作。天晓得她同胡宗南睡觉没有睡觉，你搞他这个问题干什么，你看大的问题嘛，对革命有利还是有害，将来你们研究××部的经验，这是最成功的经验。

再说，胡宗南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你拿现在的水平看是不行的，那时候有一个人被捕了，叛变了，就隐约地讲了他共产党，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共产党，胡宗南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这种事报纸上不好登。你们千万要注意，不会登报广播的，就是靠那个不清白才清白嘛！”

△康老：(在冯国民谈及现在部里有的炮轰李克农之后)(总理摇头笑)李克农讲的错话，要收集，那是很多的。

周总理：他(指李克农)的马列主义水平也不高，旧的东西很多。不是他，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个人(指总理、康老、富春)早就不在了。一个人要看大节嘛！那时是毛毛雨时代，是二十年代。咳！那时。你们有的还没有出生呢！

康老：××工作不弄几个老同志到××部怎么行呢？！××干部要看大关节，你一件件审查，越审查越不清。大关节时，看他是保卫了党还是损害、破坏了党。我举个例子，比方李清泉³⁰，大使排场是有的，但是多少年来，主席说国外××做得最及时，质量是最高的。

周总理：今天我找你们来谈心，今天谈的业务，不能一件件传下去，有的事要讲，比如李克农要讲，你们怎么能炮轰李克农？！瞿秋白这样大的问题，当然要讲。你去轰李克农，每个部都这么翻，离现实太远了吧！这种大问题，你们要问问我们呀！今天，我们接洽一下，我与康老一会儿还有会，具体问题等会儿由富春同志谈，你们的运动由富

²⁷ 申健，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

²⁸ 陈忠经，时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

²⁹ 熊向晖，前任中国驻英代办处代办。

³⁰ 李清泉，文革前历任中央调查部二局副局长、驻瑞士大使，参与中法建交谈判及李宗仁回国筹划工作。1967年5月回中央调查部参加部业务领导小组工作。1970年9月任中调部山东五七干校党委副书记。1973年6月任总参二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离开中调部系统，历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春同志负责，业务由康老负责。

康老：业务上我抓不起来，我离开了二十多年了。××部的工作，如果没有坚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很难搞好。孔原是没有政治挂帅的，这是尖锐的、隐蔽的阶级斗争，尖锐的、隐蔽的人民战争，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毛泽东思想，很容易受资产阶级侵蚀、上当。这就是林副主席讲的革命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不仅仅是××部，也是你们（指刘少文）部、三部，都有这个问题。……我过去想不清楚，邓小平为什么要杨尚昆管××部，他是二十八个半的一个。罗瑞卿管公安部，也管过××部……（对总理）我总觉得叫杨尚昆管××部不合适（总理点头）。³¹

7月21日对中央调查部“联络站”提出解放中调部冯铨、崔继瑗³²、罗青长三位副部长参加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作出批示称：“我不认得崔继瑗同志，过去也未听说过。他过去做什么工作，我更不知，现在他能否参加业务组就不能定。请业务组和造反派共同研究。罗青长同志完全可以参加业务组，这个同志在长期工作中经过实际斗争，经过考验的××工作干部。不经实际的对敌斗争的考验，只在和平环境工作中，是不易看出其临难不苟，临危不惧的忠实品质。据我看，罗青长同志是带着缺点错误的好同志。冯铨同志不是三反分子，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是不满意王明的领导的，我在××部工作时（1938-1946年），他工作是努力的，他参加过对敌斗争的工作（××工作干部参加或没有参加过对敌斗争，这是××工作干部重要条件之一）。1947年后他的工作以及犯有什么错误，我不清楚，如果没有什么严重错误，是否也可以参加业务工作，也值得考虑。³³

8月22日 对冲中央机要局事给中央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黄政基电话指示：

康生：冲中央机要局有调查部的人，知道不知道？

黄：不知道。

康：你部有个姓冯的？

黄：是冯国民吧！

康：告诉冯国民，马上把人叫回来，再冲就要逮捕，叫冯国民把执行情况用电话报告。³⁴

³¹ 《总理、康老、富春同志接见联络站、学院代表时的重要讲话记录》，1967年4月28日。载《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页468-472。

³² 崔继瑗，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67年8月28日中央批准其参加中调部业务领导小组工作。

³³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页95-96。

³⁴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页124-125。

12月28日、30日关于何长谦³⁵、方青³⁶问题三次对中央调查部作电话指示：

△12月28日

康生：方青现在在那里？是二毛子？

罗青长：在四局。

康：四局是干什么的？

罗：国外公开报刊研究。

康：怎么来这么一个人？

罗：她是跟何长谦来的。

康：那对她也要处理。

罗：是，她的问题很多，何长谦到现在还使一些青年同志和一些群众受蒙蔽。

康：那好。

△12月30日2时51分-2时54分

康：何、方二人何时抓去的？

罗：昨天下午一点左右。

康：李信给我讲了，你们准备一下，慢一点，刚刚去，要摸一下。

罗：机关同志对业务领导小组和联络站有批评，这一个月来，中央和康老有四次指示，如马金泉……。

康：你们稍准备一下。

罗：同志们认为这是我部中的一个大事……

康：你们自己先准备一下，可以开会揭露，但不要因揭露暴露秘密，不要因揭露泄密。

罗：过些时候可以揪来吗？

康：那可以。

△12月30日3时05分-3时06分

康：我想了一下，你们把主要材料准备一下，派三个人帮助审讯，他们（指卫戍区）不熟悉，这样好一些。

罗：我们照康老指示办。声讨何长谦大会可以开吗？

康：可以，不当面，可以开。

罗：我们把材料和人准备好，请李信同志帮我们同卫戍区联系。

康：那好。³⁷

³⁵ 何长谦，时任中调部四局局长。中俄混血儿。1938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共。熟谙俄、英、德、日语，长期在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文革开始后被指为“国际间谍”，1967年12月29日被捕，入狱七载，1974年死于狱中。

³⁶ 方青，何长谦夫人，时为中调部四局干部，1967年12月29日与丈夫同时被捕入狱。

³⁷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页163-165。

1968 年

4月7日 对中央调查部群众组织“井冈山”关于袁文治³⁸问题批示称：“很奇怪，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汉奸，怎么混入党内，还混入调查部。由此可见，在全国解放后，在刘、邓、彭、罗、杨尚昆、孔原等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反革命分子的把持下的调查部是混入了不少坏蛋，情况极为复杂。从1947年20多年来，在刘、邓、杨、孔把持下，中调部的事从不要我与闻，他们到底二十年干了些什么事情，我全不知道，现在我无法管这个部，希望中央文革对该部问题讨论一下，采取措施。”³⁹

³⁸ 袁文治，原中央调查部四局局长。

³⁹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调查部》，页195。